

艺
文
絮
语

李希凡 著

黑龙江
教育
出版社

艺 文 絮 语

李希凡 著



R1263656

黑龙江
教育
出版社

艺文絮语

李希凡 著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2001年·哈尔滨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艺文絮语/李希凡著. —哈尔滨: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2001. 9
ISBN 7-5316-3926-2

I. 艺... II. 李... III. 当代文学—文学评论—中
国—文集 IV. 1206. 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1)第063676号

艺文絮语

李希凡 著

责任编辑:程俊仁

责任校对:张立华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哈尔滨市南岗区花园街158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印张 15·字数 370 千

2001年10月第1版·2001年10月第1次印刷

ISBN7-5316-3926-2/1·135 定价:25.00元



2000年秋,李希凡先生作为文化界优秀工作者代表,应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邀请赴北戴河暑期休假时留影。

——吕厚民摄

十五年“从艺”自述

——代序

从1955年到1986年，我在《人民日报》做了32年的文艺编辑，大部分时间是负责文艺评论版，最后几年也主编过副刊和作品版。作为版面主编，不只要看编辑送来的原稿（当然是已经编过的），在拼版时还要重看小样，选用这一版所需要的作品，审改拼好的大样，复印时也还要推敲一番，才敢下笔签字。我们经常开玩笑说，作编辑的，在审美能力上，很可能患“精神麻痹症”。就我的感觉来说，多好的文章，这样反复地看，也要味同嚼蜡了。自然作编辑的，也有说不出的乐趣，好编辑见多识广，不只能发现好文章，发现好作者，还是剪裁修饰的好手。所以，一般青年作者在自己的成长中，都是念念不忘好编辑的。我的《人民日报》同事中，就有好几位这样的好编辑。自然，作编辑的也有自己的苦衷。所谓如鱼在水，冷暖自知。我不是一个好编辑。

1986年7月间的一天，文化部的徐文伯（后来的副部长）突然来到我的办公室，我们并不相识，他直截了当地说明来意，要调我去中国艺术研究院主持院务工作，我虽在70年代校订注释《红楼梦》时，曾借调在那里工作过一段时间，但这对我依然是个意外，我很难当时就决定下来。只好请他给我一

周时间考虑。听听家人和老友的意见。同样，也出乎我意外的是，从老伴儿到女儿，从部门的领导到多年的同事至交，都一致赞同我离开这老岗位去就新职。

的确，从大学毕业时，我就向往做研究工作。为此，在1954年还曾给周扬同志写过信，但那已是32年前的往事，而这32年的编辑生涯，又毕竟是深植在感情的血肉里。何况那里还留有自己成长的足迹，患难与共的战友。突然要离开已熟的生活，甚至那间窗户朝北并无阳光的斗室（虽然有人急于要占领它），也还是未免有点“恋栈”，那终究是一万两千个日日夜夜啊！多少欢愉、痛苦都融化在其中！

就这样，我带着惜别的心情来到了中国艺术研究院。不过，这是新环境，新工作，对我来说，一切都很陌生，甚至连称呼，都使我感到很别扭。在《人民日报》时，同志们都叫我希凡、老李或者大个儿，没有人叫过我“李主任”，而来这里，则被多数人尊称“李院长”，乍听起来，不免脸上有点发烧，很不习惯，这里虽然摆脱了“文革”的阴影，可同样也经历着工作的艰难，人情的险恶。作为一院之长，远不如编报时那样单纯：经费、职称、人事、住房，以及想像不到的杂务，纠纷、矛盾，总之是我一向完全不熟悉的事情，都会找上门来，确曾使我手足无措。但我从未懊悔过这次“迁徙”，因为我自己虽然不懂艺术科研，却在组织科研课题中，不断地获取大量的知识，并结识了一大批老中青艺术科学工作者。我主持院务工作（从1987年11月到1997年11月）的整整10年中，贫穷困窘，虽然是我始终扭转不了的形势，但历史新时期解放出来的老、中、青专家学者的“生产力”却正在摩拳擦掌，大展科研鸿图。我记得，1986年刚到艺研院时，虽有了艺术学科规划领导小组，却还没有鼓励个人上项的明确措施，艺研院全院只承担了“六·五”规划中的三个国家重点课题，到了“七·五”规划时，全院虽然又承担了五个国家重点项目，但仍然是

集体项目，而在艺研院，终究还是少数人参加的。为了摸清全院科研力量的情况，在1987年，曾进行了一次全院科研成果的评奖，设了专著、论文、资料三个奖项。专著的一等奖空缺；二等奖评了一个，也是一项研究欧洲声乐史的成果。一等奖资料奖，为《延安文艺史料》所得。最突出的是论文奖，可谓质高量多，并且多数是出自当时中青年科研人员的成果，这自然很正常，因为当时艺术学科科研规划在全国都是刚刚起步，目光主要还是集中在集体攻关的项目上，“七·五”规划似也还没有明确鼓励个人上项的措施。这就是院科研办如何使用这有限的40万科研经费的问题了。为了奖励个人上项，院科研办采取了两项措施：一是设立了院重点项目；二是对个人著作进行资助。于是，在“七·五”期间，艺研院就不只有5个国家重点课题在进行，而且有了17个院重点课题上了项，并有个人的7部著作得到了院的资助。尽管项目经费与资助都少得可怜，却也算有了一个新的开始。我不敢说这两项措施，在当时科研工作中起了多么大的作用，却总还是激发了科研人员上项的热情和信心。

到了“八·五”期间，国家项目中除重点与一般课题外，也增加了两项：一是青年基金项目；一是社科基金项目。各项“八·五”课题艺研院共获得22项申请的批准。有了比较多的国家项目的经费，我们那点少得可怜的所谓院重点经费，实是难再启动了，所以，在“八·五”期间，我们把它完全用于“资助”，资助了25项个人课题的撰写和出版。

自然，各研究所撰写出版过很多专著，并非都是向科研办申请过资助。这就说明，当时40万科研经费还能保证用在适当的地方。其实，搞艺术科研的人穷惯了，要求并不高，个人搞课题，资料都靠自己跑图书馆长期积累，那时也没有现代的科学手段（如上网）。最后，可能缺那么几千元，资助一下，就成全了他这个项目的完成。所以，这40万还是能干一些事

的。那时的艺研院虽穷，但别的机关，特别是大专院校也不富，没有现在这样一位教授和同一等级的研究员，年收入相差几万或十几万元。

各研究所每年都有不少专著问世，继'87年以后，全院又曾举行过三次不同类型的科研评奖，其中还特别举办了一次中青年论文评奖。在这段时间，尽管社会风气已经起了大变化，艺研院却还能自得其乐，科研空气很浓。那时各研究所都办有一个刊物，或双月刊或季刊，也还算保留着一块发表科研成果的阵地，但已不是由院经费出资，而是由文化艺术出版社承包出版了。但这种好日子，到我工作的后三年，却在商品大潮的冲击下维持不了啦，因为各所刊都是学术刊物，印数不多，而对出版社来说，每年却是几十万元的负担，使它的经营越来越困难，我们明知各所刊自筹经费很艰难，却不得不采取行动了。真是适者生存，实际也不像我们预想的那样糟。新创刊的美术研究所的《美术观察》，已办了20多年的红楼梦研究所的《红楼梦学刊》，以及音乐研究所的《中国音乐学》，影视研究所的《都市影视》，都还继续存在并发展着，只有戏曲研究所的《戏曲研究》、舞蹈研究所的《舞蹈研究》、话剧研究所的不定期的研究刊物，都被迫停刊了。院里只出经费继续办两个刊物，即院刊《文艺研究》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批评》，后者还是只管出版发行，稿费却要自筹。《文艺研究》可能因为学术性太强了些，据说现在越办越困难，倒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批评》，现在还可以完全自筹经费办刊了。

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50周年大庆之际，社会科学，也包括艺术科学，终于迎来了第一次国家项目的评奖，“七·五”，特别是“八·五”各类课题均有参评并获奖，而且有一项一等奖，一项二等奖，多项三等奖。与此同时，文化部也举行了第一届文化艺术科学优秀成果评奖，虽然这次评奖的范围很广，不少老专家的一生有成就的专著都获了奖，但“七·

五”、“八·五”国家与院的重点项目，还是占了获奖的多数。这对处于世纪末困境中的艺研院的科研工作者，总还是个小小的慰安吧！

因为艺研院是我国唯一的艺术综合研究的最高学府，我希望在自己任内能完成两项基础课题：《中国艺术学》与《中华艺术通史》。在“八·五”社科规划大会上我特别提出了这两个项目。《中国艺术学》被正在筹办中的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彭吉象教授承担了去，并按时完成了撰写和出版任务。1999年还获得了第一届全国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而《中华艺术通史》这一填补空白的综合研究课题，却因无人问津而“转空”。我认为，这个综合性研究课题理应落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学者专家的肩膀上。因为艺研院已有了艺术门类史的多种科研成果（如我在《总序》所讲到的）问世，积累了相当的资料，也掌握了各门类史的发展规律和特点，特别是十大文艺集成志书系统工程在全国的活动，更广泛地开拓了艺术史论的视野。只不过，这样一部需要集体攻关的大型史书，在研究和撰写过程中，一定会旷日持久，遇到种种困难，组织工作不必说，就是经费来源，如果按照当时国家重点课题的资助，也只能是九牛一毛……所有这些，都是使人望而却步的原因。

到了“九·五”立项，全国社会科学领导小组召开研讨会时，曾有过雄心勃勃的设想，并确立了社科各专业可申报国家重大课题，经批准、完成、评定后，还能获得国家出版补贴。这使我们又想到了《中华艺术通史》。院科研办召开了两次老中青学者论证会，就撰写通史的意义和艺研院承担这一项目的可能性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自然意见是有分歧的。有些同志持慎重态度，以为我院擅长门类研究，综合研究能力还不够，不要太冒险。有些同志则认为，艺术有个性差异，但也有共同规律，即使研究一个时代的某一门类艺术，也决不是孑然孤立的，而必须兼顾同一时代的其他艺术门类作整体把握，才能真

正阐明个体的发展。至于艺研院应否承担，有无能力完成这一填补空白的工程，大家却以为，困难不少，但艺研院无可推卸，应敢于承担，努力完成。

院科研办主任林秀娣同志以及各门类艺术的专家苏国荣、陈缓祥、顾森等同志都认为，这样一项大工程，又是我提出来的，还是综合研究的项目，只能由院长出面组织，才有跨专业集体完成的保证。这对我当然是很大的压力，但又无法辞谢。于是，我采取了“请君入瓮”的对策，既然都有责任感，就请他们都来担当责任，作副总主编。而科研办也要组织一个编辑部，负担起日常工作来，以便取得组织集体大项目的经验。

几位副总主编也的确立即满腔热情地投入了前期的组织工作。首先是各分卷主编的人选，因那时我还在行政岗位，要考虑的不只是《通史》，还有各所的工作。因此，物色人选的原则之一，就是不能把各所所长圈罗在《通史》项目里，以免影响全院的工作，然而，我与几位副总主编确定的各分卷主编的“点将”，不只得到了各所所长的热情支持，而且也得到了受聘的专家学者们的慨然允诺。自然，更使我由衷感激的，是热心于为学术研究铺路搭桥的出版界的有志之士。先同我们接触的，是中国青年出版社，总编、责编，甚至封面设计、美编，全班人马，都来艺研院当面进行商谈、策划，对《通史》的项目表现了极大的热情。中国青年出版社，一向为广大读者所熟。代表17年文学创作辉煌的“三红”（《红日》、《红旗谱》、《红岩》）“一闯”（《李自成》），都是它出版的。90年代初，他们曾组织出版了一套向青年普及和加强文化和道德修养的“中华文化集粹丛书”，我奉文化部之命，主编了其中的《艺苑篇》，在90年代曾多次重印，并在台湾出版。在出版界，青年出版社虽非“文艺专业”，却在文艺界享有很好的声誉。在我的心目中，他们的编辑、校对、美编，都很出色。使我感到抱歉的是，《通史》启动时的早期经费投入，对这部长卷毕竟太

重要了，而即使有规划办的资助，在当时的情况下，显然也是很少的，何况我既是艺研院管科研的常务院长，又是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分工主持国家课题的副组长。我很想自己领导的项目能自筹经费。所以，尽管中国青年出版社已经允诺将给予早期投入，我总觉得对于他们的“非科教”出版社，未免负担过重。而我的那几位副总编辑，又都是搞集体项目的行家里手，这方面的谈判工作，都是他们在进行。据他们的接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河北教育出版社，都对这个项目有兴趣，特别是北师大出版社常汝吉社长，已同意签约。这增强了我们的信心。

《通史》的启动就这样开始了，《通史》的研讨和编撰已历经四年，其中种种自是难以尽言，但2000年初稿和二稿已基本完成，倒是确实的。在这中间，文化部领导、教科司以及艺研院领导，都曾给予《通史》以关心、支持和大力帮助。《通史》的分卷承担，虽然多数分卷主编，都是来自本院各所的研究人员，但是，撰稿人却是来自北京以至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约30余位，至于特约审稿人，更是劳动了不少国内各社会学科的权威学者。目前，三位执行副主编与编辑部奋战了半年进行统稿，业已完成7卷，送师大出版社审阅定稿。我们希望，也努力争取，在中国艺术研究50号院庆之际，《通史》正文13卷能全部交付出版社。

我想，我们是尽了力的，我们的一位忠诚的战友，《通史》常务副总主编兼明代上卷主编苏国荣同志，在作为先行卷交稿之日，也是他病倒之时，而且不及一年，他就离我们而去了。最近，又有一位分卷主编刚刚完成二审改稿，就因患绝症而进了医院，吉凶难卜……《通史》毕竟是一项填补空白的大工程，一项开拓性的课题，遗漏、“误谈”，以至失之粗浅，在所难免。我把这一组《通史》研讨会上的发言和《总序》选辑在这里，本意也只是立以存照而已。

做了艺研院的行政领导工作，就不能不置身于各门类艺术的学术会议之中，或主持或“代表”，总得“遵命”讲点什么，这就逼你去看资料，想问题，做点准备，有针对性地讲几句，还得说点一得之见来，这也是我十五年“从艺”的一部分，虽勉为其难，却也开阔了眼界，既反映了当时艺术研究现状的一角，也留有自己的一段生活足迹。我是认真的。

我已经出版了19本书，其中只有一本散文集《燕泥集》，请袁鹰同志作了篇序。我深知为人作序是件很难为的事。不读原著，王顾左右而言他，是对作者的不尊重。而阅读原著，确实是费时费力，又未必能概括得好，说出对作者、读者有益的意思来，可求作序的又往往是知交、同事或小友，一般是难于推辞的。我第一次是奉刘梦溪同志之命，为他的《红楼梦新论》作一篇跋，书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记得还是一本畅销书。梦溪现在已是从事中国文化研究的著名学者，大概早已忘记这本处女作了。

以后，由于年龄渐长，境况变迁，写序也成了工作的一部分。自然，读一本有创见的新著，还是第一读者，不只增长知识，启发思考，还是一种精神享受，写篇一得之见的序言，也并非好为人师，实是一次与作者、读者的思想感情交流。20年来，也写了近50篇这样的文字，分别收集在我的《文艺漫笔》、《文艺漫笔续编》、《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贡献》以及这本《艺文絮语》里。即使平均以20万字计算，也读过上千万字的书了，获益匪浅。

旧习难改，在本书的第一辑的文章里，还收有几篇对意识形态领域某些问题发表某些看法的文章，也不过是对一些人用道听途说，多方拼凑小道消息，彻底否定建国初期几次党所领导的思想文化批判，丑化毛泽东同志，为胡适甚至武训张目的现象，提供点历史真实情况，说点不同意见。

今年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建党80周年，全国正在进行热

十五年“从艺”自述

烈的庆祝活动。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者，从来都是重视意识形态领域问题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就是在论战中以真理战胜敌人获得群众的。如果共产党人自己就放弃意识形态的武器，在当今世界必将自食其恶果，岂只一个李洪志的法轮功猖狂肆虐，为害人民！

2001年6月15日于北京

目次

十五年“从艺”自述

——代序·····	1
-----------	---

第一辑

光辉灿烂的五千年历史文化·····	3
-------------------	---

弘扬文化传统 修筑“文化长城”

——在 1995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传统文化保存

东京国际会议上的发言·····	12
-----------------	----

源远流长 古今相承

——在 1995 年中印文学传统研讨会上的致词·····	17
------------------------------	----

“五四”文学革命的伟大历史意义·····	20
----------------------	----

继承发展革命文艺传统·····	25
-----------------	----

关于建国初期两场文化问题大讨论的是与非

——答《文艺理论与批评》记者问·····	35
----------------------	----

新世纪的呼唤·····	53
-------------	----

路正远正长

——在《文艺理论与批评》创刊十周年座谈会上的

答谢词·····	60
----------	----

青史终能定是非

——在 2000 年 3 月 9 日《诗人贺敬之》研讨会上的发言··

·····	64
-------	----

“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

——在 2000 年全国乡土文学创作研讨会上的致词·····	73
--------------------------------	----

第二辑

高标准要求把这部综合的艺术通史写好

——1996年8月20日在第一次编委会上的讲话 81

关于“中华艺术精神”总体特征的一种理解

——1996年11月22日在第三次编委会上的开场白 95

发掘传统 发扬传统

——1997年1月24日在第四次编委会扩大会议上的

发言(摘要) 99

史论结合 以史证论

——1997年4月19日在第五次编委会上的

发言(摘要) 104

有了整体把握,才能有准确的概括

——1997年4月24日在第六次编委会上的

发言(摘要) 109

贯串写作主旨 力求体例统一

——1998年1月9日在第二次样章样节讨论会上的

小结 115

导言是统帅和灵魂

——1998年4月20日在第九次编委会上的发言(摘要)

..... 121

写好导言 纲举目张

——1998年8月23日-27日在第十一次编委会上的

发言(摘要) 127

把握传统 瞩目未来

——《中华艺术通史》总序 137

丰富的遗存 智慧的创造

- 《图说中国艺术史丛书》总序 190

第三辑

再接再厉 再创新的佳绩

- 中国艺术研究院'94 优秀科研成果评奖颁奖会上
的小结 197

珍贵的献礼

- 大型文献画册《开国元勋》后记 204

艺苑精华 人才荟萃

- 序《中国当代艺术名人大辞典》 207

以艺术掌握方式为中心范畴的美学探索

- 序那熙震的《艺术掌握论》 212

持之有故 言之成理

- 序杜文国、陶伯华的《艺术变相论》 216

坚持真理、锐意开拓

- 序艾斐的《艺术创造的文化感应》 222

于细微处见精神

- 序郑荣来的《文艺批评漫笔》 226

百年中国音乐美学的总汇

- 序《20 世纪中国音乐美学·文献卷》 231

闻乐如小醉

- 序田青的《历史的性别》 234

广纳深收 书论双精

- 序《钟明善书画集》 238

衣冠王国的历史实证

- 序李之檀的《中国服饰文化参考文献目录》 243